

馮亦代文集



據說大學館里 藏有比中國任何地方的林村都多。等，我想我今後也不會偏為他種上的生物。

書話卷

3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就是那裡書為我開了一窗進入文學聖殿的大門。我從小就要吃這「苦」，嘗一嘗有我的「苦」的滋味。我在這門下那書士隱微的文學家的造夢。

我相識人生的遭遇，一如新利國在「鑲窗」記得在十歲讀書時，我就有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學，那時我們的發表慾很旺盛，就組織了几个什麼就在杭州某一日報由几个同學的筆名發起一個刊物。我現在已記不清這刊物的名稱。

I217.2

F669

3

邓九平 编

冯亦代文集

书话卷 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自然与灵魂的合唱

——读巴荒《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尽管我已读了几遍巴荒的《阳光与荒原的诱惑》，应该把我的读后感写出来了，但我总觉得有种压力，迫使我无从下笔。从我识字断文以来，中外的文章我也读了一些，纤巧的、旖旎的、幽怨的、潇洒的、愁苦的、快乐的……名式各样都有，不过如巴荒笔下那样凝重的历史感、艺术感、生命感的文字，我却是第一回读到。这是种黄钟大吕的乐曲，又是种自然与灵魂的合唱，人间难得听到的交响乐。

她来到大地与穹苍相接的地方，在绚丽的阳光下，成为追寻“阿尔的阳光”的大画师凡高。如果凡高也到了这块历史与现代交织的锦绣江山，他还会要再去找“阿尔的阳光”吗？

但是这位年轻的、体态弱小的东方女儿却带着她的诗情

和笔来到了这历史忘掉它脚步的地方,写了为人们所遗忘的故事,摄下了天地间那斑斓的色彩。在绵绵的诵经声里,她感觉到了岁月;在菩萨的宽厚笑颜里,她看到了人类残酷的战争。古代、现代、当代,人从愚昧到开化,到搅拌着更愚昧和更野蛮的文明,这些只能也将在风化的泥石里,和风雪与晴和的时序中,留下它们的脚印。

这是一本独特的记游书,却不是出之于一个普通旅游者而是由一个独特的灵魂记述下来的。说它独特,因为它不仅是记游,它是把阳光、午夜、历史、世俗、神话、宗教、艺术、孤独感、高原反应糅在一块的文字;作者在太阳与荒原中见到了人世的轨迹,有些话是她点破了人与大自然的感应。

这些记游的文章,我最感有意义的是《无人区·通往阿里》、《扎达遗梦》、《古格日记》诸章,但是要谈巴荒如何投入阳光与荒原的怀抱,还应从她进入“日光城”说起。

“日光城”是充满阳光与宗教神秘的处所,是“一个特别受宇宙恩宠的地方”。“如火轮般燃烧的太阳”,使巴荒觉得“一种绚丽的色彩和强力的热中沸腾的东西在我体内扩张”。早晨,一等太阳燃烧起来,她就急匆匆地渴望融进“拉萨金属般闪光的世界”,她从此也融进了阳光与“祈祷的潮声和转经的步声……”,她投入了另一个历史巨轮的辗转之中。拉萨不但是一个宗教的城市,也是个世俗的地方,更多的是佛教艺术的集中点,它构架着艺术家梦魂萦绕的美的宫殿。

巴荒沿着雅砻河谷去追踪历史的陈迹,她感到泥土是活的,石头是活的,它们是历史和宗教的见证,随处显示了自然的残酷与人间历史的嬗递。从昌盛的古国到土丘与石头,即使佛的宽容笑意也无法使它们永生不朽,除了宗教的虔诚,就

不能拉回这时日的过隙。都松芒布结墓的石狮和松赞干布墓顶部通向小寺的栈道,既不能镇住时间的流逝,也无法通往常驻的永生。

于是,走向阿里这个无人区,似乎与苍穹只有一步之隔,但是看到的还是风化的泥丘、残碎的石头,那个经历了历史曾经有过显赫的驻步,窥到了“隐秘的生命之源”。

圣徒们向往的冈底斯山的雪顶就在眼前,人们对它可望而不可即,它给予人们祝福,在五百轮回中免受地狱之苦,但往往朝圣者拜得拜不动了,拜到再也起不来了;这一切并不是逝去的故事。

《扎达遗梦》和《古格日记》里追溯了古格王朝的辉煌史实,这里是个发掘艺术家宝藏的地方。关于西藏的史实和佛教艺术,我所知甚稀,对我,阿里简直像个千古的谜。读了巴荒的文章,我得到了满足。不过巴荒却经历了“人世的艰难”,我不能想象当巴荒逗留在阒无人兽的荒原孤屋里时是怎样度过的。但是她有执著为艺术渴求而牺牲一切的灵魂,这是常人所不能想象更无法可以实践的。因为她不是欣赏的旅游者,而是一躯求索的执著。

最后是《走出荒原》,她从与人隔绝的世界重回人间,带给我们的是一本《阳光与荒原的诱惑》,这是一本摄影与散文的合集,是文字与艺术及大自然给予读者的瑰宝。它使我们读后兴起了回归自然、回归历史、回归艺术的向往。古代的哲人曾经说过,为人一世,总得留下一些痕迹,巴荒留下了她的文字和摄影,点燃了我们焦渴的期待。

三十年才写成的小说

早在 60 年代初期,法雷·史特劳斯与吉芳书店就做出该店即将出版作家哈罗德·勃罗德凯长篇小说处女作的广告。到 70 年代后期,克脑甫书店又宣称勃罗德凯长篇处女作即将出版发行的消息。到 1991 年,法雷·史特劳斯书店重新刊登勃罗德凯长篇小说业已出版的广告。整整花了漫长的三十年,这本难产的长篇才终于问世。作家勃罗德凯被讥为“美国文学界中犹豫不决的哈姆莱特王子”,他原书提名为《动物聚会》,也被讥为“现代神话中的杰作”。

勃罗德凯以前只出过一本《初恋和其他的忧愁》(1958),还写了一些玄思冥想的小说在刊物上发表,因此不少批评家如哈罗德·勃罗姆等宣称他是“当今的一位美国普鲁斯特”。编辑戈登·列希,这位被作家勃罗德凯称为“给他小说写作不少梦幻建议”的人,则认为这部迟迟出版的书是“当前世纪美

国需要的小说”。这些推崇之词全成了这位雄心勃勃的作家的沉重负担。

1964年，勃罗德凯将这部小说卖给兰登书屋，1970年版权归了法雷·史特劳斯书店，勃罗德凯不断将原稿修改重写，也使书店不断宣告此书即将出版的消息。1979年版权又为克脑甫书店购得，书名为《动物聚会》，被认作“这部小说有经典之作的模式”，最后这本书稿又回到法雷·史特劳斯书店。如今这部小说成了“杰作”，至少可以说此书是有八百三十五页厚的巨著，书名已改为《溜跑了的灵魂》，读者们可以决定这部小说是否是美国文学中“夜郎自大的蠢货”了。

看来除了勃罗德凯自己，没有多少人为这些溢美之词所感动。不过作家本人却有意无意地利用这些谀词作为他不断修改原稿及迟迟出书的策略。他对来访的人说：“如果这些人对我的赞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便可能成为英语作家中的佼佼者，而且可以媲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弥尔顿；这是一个从圣路易来的只受过一半教育的犹太人的前途。……在白日梦里，是这样的，但在现实生活里却并不然。”

在白日梦里，这部小说差不多已接近完整了。但在现实生活里，勃罗德凯却在作家圈内蹑着脚走路，他是已有一个女儿的父亲，并与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遇到的妻子离了婚。过了较长时间的单身汉生活，以后由友人介绍认识了女作家埃伦·施万，两星期后她便离开了年仅二十三岁的丈夫，而搬到勃罗德凯的居处。他们在1980年结婚，勃罗德凯在康奈尔大学教书，并为全国广播公司改写广播脚本。他自诩为“惊人的晚餐席上的嘉宾”，“未来时代的声音”。他说：“为什么要把我比之梅勒或厄普代克呢。我没有他们那种胆量，我可以保护

自己说,因为他们并没有我那种危险的启示要传达给世人,但也许我只是自以为是,自得其乐罢了。”

只有作品才能评定一个作家,不过这是看不见的东西。一直到 1991 年勃罗德凯六十一岁时,才拿出了他的杰作《溜跑了的灵魂》,这便是读者等候三十年的“伟大的书”,但是它值得不值得写成八百三十五页和售价三十美元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这不是“皇帝的新小说”,也不见得是“过去生活的回忆”,那就完全要由读者自己来下判断了。

1992 年 1 月 16 日 听风楼

《纳巴科夫传：美国时期》

《读书》1991年5月号曾介绍美白里安·鲍德的《纳巴科夫传：俄罗斯时期》(1990)，叙述纳巴科夫流亡美国前在俄罗斯等地的生活情况，读者于欣赏此书之余，也以早日得睹纳巴科夫在新大陆遭遇为企望，而鲍德的续作《纳巴科夫传：美国时期》也终于在1991年秋季出版了，使读者得窥纳巴科夫一生两个时期的全豹，实在是一件幸事。

弗拉迪米尔·纳巴科夫于1940年5月取道法国圣·纳泽尔直航纽约，同行还有妻子维拉及六岁的儿子狄米特里。纳粹侵入法国，先是迫使他们逃离巴黎，以后又迫使他们一家远离法兰西。正如1917年，布尔什维克自彼得堡驱逐他们一家逃离克里米亚，栖身于英、德一样。对纳巴科夫家属而言，移居美国只不过是长期流放的最后一站而已。

好像他预计到将有人为他写两卷本的传记，纳巴科夫在

自己的一生中间一折为二；他的政治遭遇都集中在首卷之中。他的自传《记忆的话》也写到他挈妇将雏到圣·纳泽尔码头登船驶向自由天地为止。这就是鲍德《纳巴科夫传：美国时期》的卷首所写的开头章节。

纳巴科夫于 1899 年出身于一家饶有财产的贵族家庭，在富裕的环境中成长，十七岁时即继承了一处 18 世纪建立的罗兹德斯特维诺农庄，使他成为俄罗斯贵族中最辉煌的一个。他还是个天才，同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诗集》。他的父母对他十分溺爱，甚至养成了他搜集蝴蝶的爱好；这一爱好从 1906 年开始一直到他 1977 年去世前几个月才终止。

纳巴科夫的父亲虽然是显赫贵族，却与反沙皇政府运动有较深的牵连；他在 1922 年被疯狂的沙皇分子暗杀，死在柏林的一处演讲厅里。但是年轻的纳巴科夫却对于这种纷纭世俗的行为置身事外，他爱好诗歌而且进入早熟的性生活。在一件特有的事件中，父与子于 1919 年撤离被围的塞瓦斯托波尔去雅典中途，竟在轮船甲板上对坐弈棋，四周的机关枪扫射声却经常打乱了他们的思绪。

这就是纳巴科夫对俄罗斯的最终体味。以后的二十年中，他用“希林”的笔名以免与他父亲因同名而引起误会，成为俄罗斯移民年轻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盛名的降临使他出人头地，不过只限于柏林、巴黎、俄罗斯放逐者的这个圈子之内，而且也得不到多少稿费。

30 年代，纳巴科夫的小说即已翻译成德法两国文字。1936 年纳巴科夫的《模糊的照相机》在英国出版，署名为纳巴科夫——希林；两年后又以《黑暗中的笑声》在美国刊行修订版。即使如此，当纳巴科夫 1940 年 5 月 28 日在纽约抵岸时，

还是默默无闻的。

从欧洲逃亡是纳巴科夫在历史巨掌中受难的最后“滑坡”遭遇。但是纳巴科夫在美国居住的二十年中，他一家就从来没有购置房产或任何不动产；他们从一处租房迁居到另一处租房，而在夏季，则由一处汽车旅馆搬到另一处汽车旅馆。1961年，他们在瑞士蒙特勒租到了一处豪华饭店的房间，原先只是为了有个短期的栖宿地，可是就此稽延不走了——有时是去近处旅游，有时则调换房间——如此一直到纳巴科夫去世。只有在蒙特勒大饭店住下，他们一家人才开始慢慢感到最后是安置下来了。

“为什么住旅馆呢？”鲍德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鲍德引用了纳巴科夫自己的话。“最主要的理由，是我以为，满是毕肖我儿时环境使我满意。当然我不会使一切都正如我的回忆——那么，为什么要去为无望的逼真而自找麻烦呢？”而且纳巴科夫还接着说，旅舍生涯“排除了私人购置房屋的麻烦。”

纳巴科夫一生可以齐中腰一折为二，后半生的四十年花在对过去的时间的回忆的沉思熟虑中，从而形成了一本本小说，重复运用了那些前半生的经验。他再不能回归故乡了，不过他也不为此损失而一掬懊丧之泪。相反，他相信，据鲍德的话，人的生活并不是“同一方向的运动”，而是“较为自由的，有令人惊异的蹭蹬穷达以及方向变换的回顾，最后落入于一种独特的模型，而成为一个人的命运”。

在《俄罗斯时期》里，鲍德作为大家的文学教授必须新炙许多文坛上的历史事实，作为讲纳巴科夫课的内容，并以之与纳巴科夫《记忆的话》中生动的叙述相抗衡。而在《美国时期》中，鲍德的工作便比较简单。《洛丽塔》一书的成功，使纳巴科

夫的经济得以自立,一年中,他花九个月在大学里授课,先是斯坦福大学,以后到韦尔斯利女子大学,最后则是康奈尔大学——暑假里就去美国西部漫游,搜集蝴蝶标本。除了写作之外,这便是他干的一切了。

写作、教书及蝶类标本的搜集本身是不须多费笔墨的。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美国时期》给予鲍德比写《俄罗斯时期》更为有力的挑战。因为纳巴科夫后半生的活动大都是内心的,很少能飘浮到表面上来。这就要考验鲍德的本领了——即他所掌握的纳巴科夫全部行动——他不但要把两个不同时期的纳巴科夫拼凑得天衣无缝,而且要把教授生涯写得使人艳羡。

在书中,鲍德把纳巴科夫写成完完全全是个单纯的人,所有他的行动都反映了几项基本心智和性格的特征。举个例,当纳巴科夫想到文学时,鲍德就集中写纳巴科夫一些动人的细节;在提到考试时,纳巴科夫要求学生们在回答诸如关于《包法利夫人》一书中,描写爱玛的眼睛、双手、阳伞、发式、衣着、鞋子等等,蝴蝶的解剖与分类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而在纳巴科夫自己的小说中,正如鲍德所详细指出的,从来没有可舍弃的文字和细节,每一个语句的修辞都有它的意义,都是行文所需的模式。

说到模式当然是复杂的。例如在第一卷《俄罗斯时期》,鲍德就供给了从纳巴科夫用英语写作的第一部小说《塞巴斯蒂安骑士的一生》(1941)到他最后一本《看这个丑角》(1974)的细致摘要和分析。在每一例中,鲍德都极为困难地要去除对纳巴科夫的错误印象,即他是个耍诡计的人或是个冷漠操纵文字的人。甚至对《阿达》(1969)一书——纳巴科夫最有雄

心、最神秘的小说——鲍德也加以分析，认为是富有人情味的书，简直可以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和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相媲美。

《阿达》显然是本杰作，鲍德还是处处加以维护，事实上他完全可以依赖读者对于这本小说的同情与理解。鲍德是熟稔沙俄文学的人，而且对于英语亦能操纵自如，他对于纳巴科夫翻译的四大卷一千二百页普希金的《尤金·奥涅金》中的语言疑义，都加以阐释。纳巴科夫自 1952 年起到 1975 年止整整花了十三年，才完成这书的迻译以及评介；这一计划的实施，使许多读者觉得是唐·吉珂德式的，但是鲍德却不这样想。促使纳巴科夫给予普希金的顶礼是值得的，因为理解了《尤金·奥涅金》便可获得理解纳巴科夫作品的钥匙，窥知他的一生和事业。

《纳巴科夫传：美国时期》像《俄国时期》一样，成为既紧密又厚实的一张蛛网，联结了文学与个人，完全是纳巴科夫式的作品。美国的书评界认为纳巴科夫终于有了一位称职的传记作者。

《巴黎风情四重奏》

英国女作家简·里斯的作品，大概是首次在中国的出版物中出现。这个作家的作品，写得十分细腻，特别她对女人矛盾心理的描写。那些无告无助的女人，终日混迹在巴黎的所谓艺术家和作家的圈子里，无法也不愿去自己谋生，便从这个男人转到另一个男人的怀抱里，一直到人老色衰，濒临最后的日子。她们也希望有光彩的一生，但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她们所能做到的，便是陷入矛盾生活的泥淖里，无法自拔。在里斯的《巴黎风情四重奏》里，就写了一位混在巴黎洪流中的玛丽亚。她自以为可以凭她的“爱情”从此游戏人间，可生活摆在她前面的路，却又如此坎坷；其终点则一，总是无底的深渊。这些女人是靠“感情”生活的。她们从来没有对人生理智地想一想，她们只在感情，特别是男女爱情上打转转，玛丽亚何尝不想登上泥淖生活的彼岸，但她既无能耐也无决心，等她最后

不得不作一选择时,已经晚了,只有死的一条路了。作者以玛丽亚代表在生活铁蹄下辗转求生的女性,但在这个男人的社会里,她们又有什么新生的机遇呢,只有对爱情的憧憬,是无法解决生活问题的,她们幽囚在自己缔造的憧憬里,这是男性社会里女性的永生悲哀。作者虽然同情她们的遭遇,她却无法给了一条打破幽囚的生路,这是作者的局限,也是这些女性的局限,真是太遗憾了。

作家里斯的处女作,是一卷短篇小说《左岸集》,时在1927年,得到《英国评论》主编,诗人福特·麦道克·福特的欣赏,认为她有写作的才华,但里斯在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后,因为不能引起文学评论家和读者的赏识,而悄然离开了文坛。二十年后,她又萌发了创作小说的壮志,写了《辽阔的藻海》于1966年出版,从而在英国文坛上站定了脚跟,并获得了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奖和史密斯文学奖。她的《请君一笑》是一本未完成的自传,以诚恳与简洁的笔触,写下她自己的经历。

译者陈良廷是中国翻译界的老将,译文清丽可诵,也显示了原作的简洁风格,是一个值得称道的译本,当然原作在文学史上并不那么重要。

《巴黎风情四重奏》作为一本消遣的读物,是可以消磨时光的。

《尤利西斯》在美国解禁始末

爱尔兰作家乔埃斯的传世之作《尤利西斯》出版后，整个英语世界为之瞠目结舌。这部著名小说描写一个人一天的思想活动和他的行动，因为描写露骨，所以假道学视为是惊世骇俗的“春宫文学”，英美两国均予禁止发行。出售此书的只有彼奇女士经营的巴黎莎士比亚出版公司。但也不是公开发售的，有如我们今日在书摊上购买禁书一样，顾客在台上放下美金十元，彼奇女士就从台下取出一本交予顾客。生意十分兴隆，买卖双方交接，均在不言之中。美国到巴黎的游客，总须拜访这家书店，以期获得一本《尤利西斯》。当年彼奇女士在美国侨民文学界中，卓有声誉。海明威落泊巴黎时，就全靠彼奇的帮助，使他免费读了许多欧洲的经典文学，进入了文学殿堂。

30年代初期，美国禁止出版《尤利西斯》，但是盗版印刷

的却颇多,虽然偶有发现,都受到法律制裁,然而盗印者却仍不乏人。当时纽约新兴的兰登书屋创办人作家贝内特·塞尔夫为了保障作者的利益,并认为有利可图,便极力设法使该书能公开出版,始能杜绝这种盗窃行为。其时正巧有一位思想开明、名气很大的律师莫里斯·欧内斯特扬言,禁止《尤利西斯》的出版,是美国的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他愿意为争取《尤利西斯》的公开出版,进行法律斗争。此话一进到塞尔夫的耳朵,他马上和欧内斯特商定共为《尤利西斯》的解禁,作一番努力。相约由塞尔夫去巴黎取得乔埃斯在美出版《尤利西斯》的委托书;欧内斯特也同意不收取律师的出庭费,因为他是名律师,收费极巨;塞尔夫答应官司打赢,书出版后,付给欧内斯特一定比例的版税,作为报酬。至于诉讼所需费用则由塞尔夫及兰登书屋负担。

塞尔夫与欧内斯特达成协议后,即致电乔埃斯约在巴黎见面,他们在彼奇小姐的书店相会,谈话进行顺利。乔埃斯完全授权兰登书屋在美出版发行《尤利西斯》,塞尔夫先付美金一千五百元,作为定金,如书能出版,此款即在应付版税内扣除。如不能出版,乔埃斯无需退回。乔埃斯当时正在穷窘之中,而美金汇价亦高,一千五百元是一笔巨款,所以他大喜过望。他说此款是塞尔夫白送给他的,因为他相信美国政府决不会同意出版发行此书。

塞尔夫得到乔埃斯授权书后,即返纽约。不过事情只做了第一步。第二步由欧内斯特选定一位思想开明,有自由主义观点的审判官伍尔塞承办此案,所以提出诉讼必须在伍尔塞法官到纽约开庭的时间。第三步则还须把国内外文学批评家对于此书的意见塞进法庭的记录之内。塞尔夫选中了安诺